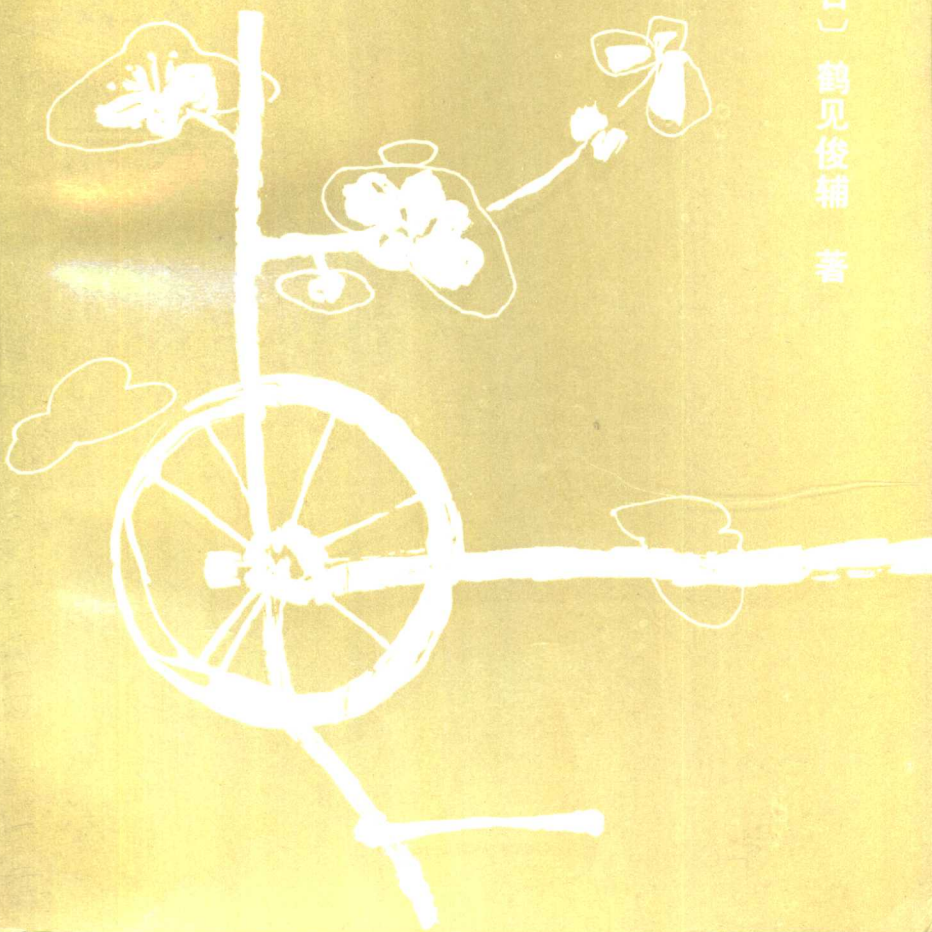


日本文化与现代化丛书

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

〔日〕鹤见俊辅 著



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

〔日本〕鹤见俊辅著

高海宽 张义素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

〔日本〕鹤见俊辅 著

高海宽 张义素 译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春市第十一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5.5印张 插页4 121,000字

1991年3月第1版 199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200册

I S B N 7-206-001052-0
D·298 定 价: 2.70元

《日本文化与现代化丛书》总序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实现了现代化，其成功的主要经验是最终避免了“全盘西化”和“全盘国粹化”，使其文化传统的创造主体，在现代化中起着动力机制的作用，在实践中确立了自己的现代化模式，即“民主主义原则、技术文明和日本文化传统相结合的形式。”（加藤周一语）也就是说，以民主主义为基础，以高度技术文明为手段，以日本文化传统作为根本。简言之，就是大文化起着主导的作用。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日两国社会制度不同，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各异，但日本在现代化进程中坚持本国文化传统，建立与西方文化“对立·融合文化模式”，并发挥着创造的主体作用，也许还有值得借鉴的地方。因此，我们特邀日本著名学者、评论家加藤周一先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叶渭渠先生、副研究员唐月梅先生合作主编《日本文化与现代化丛书》，以供读者思考、研究日本之经验，努力探索我国现代化的模式，使我国早日实现现代化。

本丛书的出版，承蒙加藤周一先生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以及叶渭渠、唐月梅两先生的通力合作，在此一并鸣谢。

编者

译者的话

日本军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和亚洲其他国家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也使日本人民蒙受了战争的苦难，日本军国主义所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这些是举世皆知的历史事实。然而，在那场历史浩劫越过近半个世纪的今天，至今仍存在着对日本军国主义及其所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缺乏足够的深刻认识的现象。同时，日本战争时期的精神史又是与日本军国主义及其所发动的那场战争的血腥历史互为密切关联的。因此，对于战争时期的日本精神史的探讨，这对于战争受害国的中国人士以及日本人士，都是十分必要的。鹤见俊辅先生的这部《战争时期的日本精神史》，对于从事这方面的探讨和研究，则会起到颇有参考价值的指南与借鉴作用。

鹤见俊辅先生是日本著名进步的思想史、精神史学家，不仅在日本学术界颇负盛名，在日本社会上也具有广泛的影响。他的著述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深刻的思想性。这部精神史的大量丰富的史料，从政治、意识形态、宗教、文化、哲学、文学等各个角度，从日本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各个侧面，对战争时期的精神史加以详尽的剖视，使我们触及到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与兴衰的内在的思想脉络，对那场侵略战争的性质与责任的认识更有了新的深度，并令我们感触到了在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桎梏下日本人民所经受的精神上的磨难。同时，这部精神史也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和全面地了解日本民族及其文化、精神传统的特性。这

些对于我们增进对邻邦的全面深刻的理解。两国人士在对那段不幸的历史的认识上取得共识并引以为戒，加强两国之间长期的友好关系，乃至促进亚洲与世界的和平与进步都是有益的。

从这部精神史中，我们还不难看出，鹤见先生站在对深受战争之害的中国人民抱以同情、支持的正义立场，对于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这与那些美化侵华战争、掩饰历史罪责的人互为鲜明对照，表现了一位史学家对历史的责任感。作品中，有些论点或史料的选用，或许与我们读者的见地有所不同，这是可以商榷的。

译者有幸翻译鹤见先生的这部著作，确是难得的学习机会，但由于笔力有限，平素又欠这方面的研究，译文中定会有不确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高海宽 张义素

1990年5月1日于北京

目 次

译者的话	(1)
第一章 三四十年代日本的探讨	(1)
第二章 关于转向	(6)
第三章 锁国	(18)
第四章 关于国体	(30)
第五章 大亚洲	(42)
第六章 非转向的形态	(54)
第七章 日本中的朝鲜	(69)
第八章 寻求非斯大林化	(82)
第九章 玉碎思想	(99)
第十章 战争时期的日常生活	(112)
第十一章 作为原子弹的受害者	(127)
第十二章 战争的结束	(140)
第十三章 回顾	(153)
后记	(164)

第一章 三四十年代日本的探讨

从现在开始，我要讲述从1931年至1945年期间日本精神史这个主题。在此之前，我略加讲一下下边要说的话。

首先，谈谈关于语言问题。由于后面所讲的基本上都是在日本发生的事情，故下面对所探讨的思想进行的分析，本来也均是用日文所表达的。现在这里是使用另一种语言的国家，我想在这里试着不用日语来讲。在此，我想只用英语来解释我们所探讨的内容，确定这一点作为我们的共同点。我选择这一方法，即刻就使我与诸位陷入一个困难的境地。我具有一个这样的信念，即虽非是逻辑方面、而在列举事例方面却可以得到佐证的信念，这就是讲英语的日本人是不可信赖的。在1945年至1952年美军占领日本时期，我曾多次向我与之接触过的美国人说明过这个问题。因此，我有这样一种考虑，就是当我讲演有关日本的什么问题时，要对我讲的打些折扣。随着1945年日本被占领开始，又经历了一些岁月。现在的日本与1945年的战败已相隔久远。日语已容许掺杂英语。由此，由英语起源的语言，出现充斥于日本的日常生活之中的状况。在报纸上刊登的广告中，我们可以司空见惯地看到类似“时髦的女装的时装展”这类表达方式。在这一句中，日语起源的单词，仅有“な”和“の”两个单音字。

下面再举一个例子，据说美国某学者研究了几年日语之

后来到日本，在图书馆读日本的综合杂志。他遇到了一些词句，尽管怎么查字典也不懂、怎么琢磨也不明白，于是抄下这句话去问日本的学者。听说这是“打棒球跑垒”的日语片假名。这句话由于是在与本来的内容不同的内容中使用的，故非日本人是很难懂的。这样，就是在外来语业已充斥日本的日常生活的现在，我仍认为，前面所讲过的我本人的信念，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根据的。

借用欧洲的语言，未必意味着这种想法是欧洲化。在短时期内，将如此之多的语言从欧洲语言中借用过来，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现代日本人对于其本身而言，则是变成了难以理解的人。诚然，我们有着失去了认识我们自己的思想的途径的一面。

第二点，我所要讲的，是这个讲义首先从战争期间在日本发生了什么开始，并作为理解在日本以外的地方发生了什么，还有在战争期间以外的时期在日本及日本以外的地方发生了什么的线索。“转向”一词是1920年在日本开始使用的，进入30年代开始被广泛使用。这不是一个起源于欧洲语言的词。由于这是在日本进行战争时期的政治气氛中产生、形成的一个词和一个概念，所以具有在15年战争期间的理性与文化性的倾向。这个词的形成，可以看作是世界精神史方面的一个概念。其中在日本，又可以说是一个极具特点的概念。而在这个具有代表性的概念中，又可以找出更好地认识世界上除日本之外的各国的倾向与事件的线索。通过这一概念，可以力求更好地理解今天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

第三点，作为探讨文化史与精神史的一种方法，被认为是从正常的倾向中脱离出来的东西，有时反而能充分反映出那一社会的文化特征。1931年至1945年在日本所发生的，并

非是一个可以抹消掉的自明治初期以来日本近代史中的偶发事件。对其认真加以研究，便可知其中有很多应积极地继承的东西，并有很多应该予以否定的地方。我们通过错误而得以成长，可以通过认识在我们所犯的错误中所包含的真理与价值而成长。

第四点，作为历史的划分，我们在这里将1931年发生的日中战争，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当日本陆军的指挥者1931年在中国的东北发动了战争，进而在这一地区进一步建立了日军可以随意操纵的政权时，这一办法在国际上是一种新的尝试，后来又被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和德国的希特勒所效仿。日本1931年在中国东北地区发动的日中战争，作为一种新的倾向的开始，给整个世界带来了影响。这样，对于世界来说，可以说是地区史的日本1931年至1945年的历史，成为在20世纪中使日本史与世界史相衔接的一个衔接点。

第五点，我还想谈及日本进入19世纪向西方开国后，在西方各国兴起了对日本的兴趣。在这一时期介绍日本的人士当中，有巴兹尔·霍尔、张伯伦、拉夫卡迪奥·汉、以及伯纳德·利奇等人。其余虽然还有许多人，但在这些人当中，陶艺家伯纳德·利奇是没有失去他在青年时代对日本曾怀有的爱恋之情，他是对日本文化没有表现出失望的为数不多的人士之一。我对此颇有兴趣。至少他与同为英国人的张伯伦、拉夫卡迪奥·汉形成鲜明的对比。其中，或许有一些原因。

其原因之一，是利奇早就对中国文化与朝鲜文化怀有兴趣；在对日本文化怀有兴趣的同时，对中国文化与朝鲜文化也曾产生了兴趣。因此，他很早以来就将中国文化、朝鲜文化视为并存者。他自己经过比较后，吸取了日本文化。所

以，伯纳德·利奇没有突然从某时开始，将过去曾认为是清纯的日本文化视为是丑恶的，或认为是值得厌恶的。

我们从朝鲜的角度来观察日本时，可以看到日本之丑陋的一面。当我们从中国的角度来观察日本时，日本则显得有浅薄的一面。从其他国家来的研究人员，仅从在日本逗留期间的感受来研究日本，当其在此基础上面向朝鲜与中国时，他就会不可避免地对日本文化产生失望。当然，如果外国人仅是出于有过对异国的兴趣这一原因，而对日本产生兴趣的话，在这种情况下，这种人的兴趣与看法，是从其原样地保持了本来所生长的国家所具有的东西出发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对日本文化的接触总是以本来曾具有的各种价值观，借日本文化之形态，按原样地使之置于一种固定的状态。这样，有时就会突然感到失望，对此不想作重大的修正而不得不终止下来。然而，如果将与另一个国家的文化之接触看作是重要的，并且要在其本人原来所形成的文化价值体系中，溶入这种异国文化的异质的价值，那么作为这种人之与日本文化接触的方法，即如同对朝鲜文化、中国文化、以及其他亚洲各国的文化一样，以这种对比的办法来看待日本文化，则容易得出一个稳定的形象。这个提议是将日本与朝鲜、中国联系起来理解的一种空间结构。而与此形成对照的，从时间结构来进行探讨的话，作为探讨现代日本的背景，以1931年至1945年长期的战争时期的日本为背景则是十分重要的。

我对这一主题探讨的方法，准备从其存在的问题着手。这部讲稿中有诸多缺欠，就是在资料的介绍方面，可能也有缺欠，请随时注意这一点。

首先关于资料，想在现代史中搜集所需要的材料进行研究而达到严密的程度，这是非常困难的。与现代史相比，远

古的历史资料似乎可以达到这种严密的程度，但实际上所需要的资料多半也已失掉了。中世纪的历史资料由于有过系统的研究，所以略为容易一些。但是，其与中世纪史的真实情况相比是否完备，也是颇有疑问的。从现存的资料来看，或许可以阅尽现在所存有的资料，且从难以推翻如此得出的著述的状况看，与现代史相比，中世纪史还是易于著述的。但是，在现代史方面，包括文化史、精神史，甚至连达到认为是难以推翻的这种程度的自我满意，都是困难的。

关于材料的解释方法，也并非能简单地取得一致意见。我们如何解释现代事物，也因我们抱有何种偏见地生活而相异。我们尊重这种难以避免的解释的多样性，并需要清楚地了解这些情况。现在我在这一讲义中，就试图描绘有关我们所目睹的必要事实的笼统示意图。如果与实际报道有出入，也要将这出入不遗漏地记录下来。而且仅出自报道的还不充分。因此，还要认识到还有许多未报道过的重要事情。今后还可能出现关于这些重要事情的报道。而且，还要看到，就是在今后的报道中，也还会有遗漏的、未公开的重要事情。

我感到，在资料搜集及介绍的方法上，实际上还有许多缺陷，有时甚至出现难以同时成立的解释，并且将不充分的资料照旧搬来引用，这是值得怀疑的。下面就来勾勒一份现代史的统一画卷。总之，我希望靠这一努力，使我们当中出现活跃的争鸣气氛。

第二章 关于转向

首先谈谈关于转向的背景。对于日本来说，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自1867年新政府成立之后，在几乎整整40年的时间里，日本国民是在怀着攀登、并必需攀登文明的阶梯这种使命感的情况下生活过来的。这里只是引喻有这种阶梯，这并不是仅对日本人而言，对于任何国家的民众，也都存在某种类似的引喻的东西，即在国民的想象力中，不是常常有某种长期不断地起作用的东西吗？可以说，自明治时代开始以来，存在着文明的阶梯这种引喻的东西，已在日本国民的想象力中不断地起到了作用。

日本推行对俄战争，并胜利地结束了这场战争。这种作法，取得了在政治上及军事上超过了拿破仑、希特勒的成效。我们可以推定，在取得这种成效的背后，是因为具有领导国家能力的人掌了舵。

日本自从取消锁国政策、实施开国、并打倒过去的德川政府的封建制度、确立了新的国家政策以来，又形成了与以封建制度的身分制判断人的等级的作法性质不同的新的思想。参加打倒德川政权运动的青年一旦超越出自己所属的藩^①的境地，便脱离了原来所属的藩。其后，他们便心照不

① 藩：日本江户时代大名的领地及其政权机构。

宣地互相都作为平等的同志进行交往。按照自己的意志从藩政府的羁绊中解脱出来的侍官们，开始相互将对方看作是同志。在这些脱藩浪士之间出现的同志式的交往，使许多未脱藩而曾留在藩内、献身于同一目的的赞同者，也产生了相类似的气氛。

在反对德川政府的运动中，有许多人被捕，许多人被杀害。在这个运动进行的过程中，人们并不知道哪一位能否活下来，成为新政府的领导人。实际上，在权力过渡之前，如吉田寅次郎、桥本左内、坂本龙马、高杉晋作等运动的倡导者们几乎都被杀害了。在为实现这些已故先辈们的设想、在德川幕府之后创建了新政府的人们当中，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这些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人物，也都在明治维新之后的十年内去世了。西乡在叛乱失败后自杀了。大久保遭到暗杀。木户抑郁病死。在明治维新时期的重要领导人当中，只有岩仓具视生存下来，在明治初期的年代里，成为强有力的、活跃的政治家。可以说，除他以外，几乎所有的重要领导人，都在明治维新后的十年中去世了。但是，就是进入了明治时代以后，他们在深刻地认识到他们当中那些最优秀的人士已成为敌人的同时，仍保持了一段在倒幕中所形成的同志般的交往。

这种谦虚的认识，与为不使日本成为西洋各国的殖民地而一同保卫日本这种一致的认识相关，并赋予了作为后来的接班人的剩下来的日本领导人以某种勤奋和某种质朴的性格。他们都竭力想学习西洋文明的经验。即便是在日俄战争方酣之际，日本的国家领导者们对日本所面临的状况也未丧失冷静的判断。因此，他们没有忘记，必须在日本的国力及英美各国国民的同情感尚未殆尽之时，国家需要尽快结束与

俄国的战争。他们并未以自己战胜了俄国这种幻觉来欺骗他们自己。正是由于在领导人当中有了这种共同的认识，陆军和海军的最高司令官们才允许内阁进行反对日本带来名义上的得益的媾和。领导层没有惧怕违背战争时期形成的舆论倾向而对此进行了决断。关于领导层的气质的形成，与其说是从明治维新开始，不如说是从幕府末期至日俄战争期间形成的，而我这里所提到的，是想将明治时期的日本领导层与继其之后的大正、昭和时代的日本领导层加以明确的比较。现在在这里所列举的有关日俄战争中的日本政治和军事领导层的各种特点，于昭和期间的15年战争开始前已经消失了。

日俄战争结束后，活到此时的明治维新政府的领导人，他们抱着日本已赶上了西方先进国家的看法，使紧张得到了缓和。他们自封为华族^①，为自己授予公、侯、伯、子、男一类爵位，并加以庆祝。他们打算封日俄战争中的陆军大臣一类人物为男爵，日军司令官为子爵、伯爵一类爵位。他们之中最上层的一些人士已经去世。有些明治初期竭力进行了奋斗的领导人在此以前肉体上虽然还活着，但这时却如同过去的吉基尔博士的皮肤中栖存着另外一个人海德^②的状态一样。可以说，在他们的肉体中所具有的已是不同的人格了。关于他们后来所付诸的努力，就是反复吹捧明治维新的故事，在反复的过程中，他们自己在故事中的形象也就更加变得越发伟大了。从实用的角度来看，这成为他们进一步爬上

① 华族，日本明治维新后，于1869年废除公卿、诸侯之称，改称华族。1884年又颁布“华族令”，将被封为“公、侯、伯、子、男”爵位者及其家属称为华族，享有世袭等特权，战后取消了这一制度。

② 吉基尔、海德：这一典故出自英国小说家斯蒂文森（1850—1894）的小说《吉基尔博士与海德》。

贵族阶级的阶梯的一种方法，并发挥了作用。

1945年日本战败后，接着曾有过一段反思的时期，反思过后，日本的舆论又要求逐个地恢复过去时代的制度。在这种呼声中，几乎没有什么旧的制度没有被提出来。明治以后到战败期间一直实行的华族制度是仅有的一个例外，被取消了。在战后迄今的34年中，想不出报刊上曾出现过一个主张需要恢复华族制度的社论或读者来信之类的东西。明治以后建立的这种身份制度未曾起到什么好作用。整个战后时期的舆论至少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与此相反，关于从明治中期开始实行的与其略有不同的身份制度，即根据学校升学考试制度确定的身份制度，最近尽管受到学生们的多次抗议，但看来至今仍然受到国民的广泛支持。这种升学考试制度，本来是日本仿照中国的考试制度制定的。只是这种升学考试制度在明治以前，没有在日本所有各阶层的人们当中实施。直至明治以后，考试制度才与学校教育相结合，并面向社会各阶层。由于这一原因，日本的考试制度及由此而形成的学校制度，现在才得到广泛的拥护。

明治以前，日本就已经相当广泛地实施了初等教育。明治初期，男性人口的约40%—45%，以及女性人口的15%，已具有了读写的能力，并且具备了算术方面的实际知识。这是德川时代的教育给明治时代留下的遗产。这种教育与民众的日常生活相结合，并不是与选拔考试相结合的。

明治以后，新政府并不准备照搬明治以前的教育制度，而是努力采用以欧美为样板的崭新的教育制度。他们在所有的学校之上设立了东京帝国大学。只要通过几度选拔考试，任何一个国民都有希望升入这所学校。这成了为刺激全体国

民求学的心理、而将西欧文明传入日本的有效手段。

如同罗那尔多·多亚在《学历社会》(1976年版;日译本1978年版)中所讲的,早在1880年,日本政府就已经根据考试制度选拔官吏了。当时,东京帝国大学法律系的毕业生可以免除这种考试,从其履历就可以得到就任高级官职的保障。这种制度也给企业带来了影响。到1910年,非官办的、极其大量的私营企业,以至于形成了仅从大学毕业生中录用新职员的习惯。报社也开始采用了这种习惯作法。在这一点上,日本成了比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还先进。

同时,正如多亚所列举的例子,到了1955年,在《日本绅士录》中所载录的人士中,有70%是大学毕业生,或专业学校毕业生。而在英国的同类人名录中,1958年的企业主要负责人,仅有21%是大学毕业生。在英国的主要公司的二百名最高负责人中,仅有24%是大学毕业生或专业学校毕业生。

自日俄战争结束后所开始的时代以来,在日本的官僚、企业界、新闻界等领域中,其领导层均为大学毕业生。其核心力量都是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律系的学生。日本虽然经历了自1931年开始的15年战争的失败,但这一状况仍然没有改变,其后就是在美军占领日本时期,也仍然没有变化。

以上所介绍的,有助于对东大新人会的重要性的了解。1917年爆发的俄国革命,给日本的大学生带来了很大影响。翌年7月23日,爆发了抗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大米涨价的“夺粮暴动”。事件由远离日本首都的地方发起,又由此扩展到大城市。这并不是由政治家策划的抗议行动,而是由地方上的群众发起的自发的抗议行动。日本人通过自身的行动广泛地认识到,这一“夺粮暴动”显示了民众的力量。从这个